

文章编号:1000-0690(2000)02-0102-08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李国平, 杨开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资料与数据,并结合企业调查,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集中、时空推移、技术含量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特征及形成机制。基本结论为:第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高度集中,但随时间推移,从沿海向内陆、从大城市向周围地区转移,集中程度减弱;第二,技术含量逐步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成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对变化,是决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第四,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技术与人力资本积累,以获取市场份额为中心的对华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出现了从沿海向内陆推移的趋势;第五,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与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以及中国国内地区间产业与地域政策的变化也是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的重要要素之一。

关键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产业转移;空间转移;特征;机制

中图分类号:F419.9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中国在20世纪最后的1/5时间,开始了参与国际竞争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在近20年的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工业生产潜力的地区之一,因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际资本流入国。截止1996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83 273个,协议外资额4 693.2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 772.17亿美元^[1]。1997年和1998年又分别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452.57和456亿美元,中国作为巨大的海外投资市场而受世界注目。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随之增大,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当部分来源于外资,国内各地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额增长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不足,仍然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

中国在近2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外资主体企业而言,中国的区位优势(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力)在发生着较大

变化。首先表现在劳动力成本的逐年提高,第二是优惠政策在阶段性地取消,第三是产业结构升级压力,产业及地区政策开始对外资企业进入的限制作用加大。对于我国吸引外资而言,一方面因不同的外资主体与不同的行业类型,不仅仅有其各自独特的行为组织方式和运营机制,而且有着不同的投资动机及其区位选择的原则,特别是随着投资主体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始从初期的单一事务所或工厂向组织结构多层化的多工厂(事务所)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差异,加剧了中国业已存在的区域差异。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地域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面临着新的制约与机遇。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从空间侧面把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规律性,建立起适合的、使外商直接投资转向内陆地域(资金短缺地域)的对应策略,制定适宜的外资政策尤其是产业与地域政策,以发挥外资对国家与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积极影响,避免消极影响已日益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是伴随着跨国企业在本世纪

收稿日期:1999-06-01; 修订日期:1999-12-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9831003)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97@JL003)的资助。

作者简介:李国平(1961-),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经济地理学专业。E-mail:lgp@urban.pku.edu.cn

60 年代以来的发展,而从欧美开始的。从不同角度阐述国际资本与跨国企业形成,出现了众多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及跨国企业理论,其中主要有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 G. D. A)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2],弗能(Vernon, R)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3],海默(H. mer, S. H)的垄断优势理论^[4],海雷那尔(Helleiner, G. K.)的企业内国际分工理论^[5],邓宁(Dunning, J. H.)的国际生产综合体理论(折中理论)^[6],由巴克利(P. J. Backley)、卡森(M. C. Casson)提出,拉格曼(Rugman, A. M.)进一步深化的国际生产内部化理论^[7,8],以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9]等。上述诸理论均提供了一种从某一侧面解释一国或一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或接纳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但由于投资主体的多样性以及受资国要素条件及其需求条件的差异,只有根据具体情况,利用不同的理论以及创造或改善现有理论来解释,才能够比较充分地把握各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亚洲国家与地区,占 80% 以上。这些亚洲国家与地区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日本是 60 年代完成工业化,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则是在 70 年代或 80 年代完成工业化过程)。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局限于有雄厚经济与技术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包括规模小、实力不强的中小型企业。基于这一特点,本文试图在已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结合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实践,探讨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以解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结构及其空间转移。

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量的空间结构演化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无论是欧美式以跨国企业为中心的 direct 投资,还是日本、东亚式的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 direct 投资,都体现出一定的空间结构(即投资行为的空间投影)。空间结构作为投资行为者空间选择的结果,不仅反映投资主体对空间要素的需求,也反映空间(地域)自身的特性以及要素组合条件的差异。投资主体的空间偏好取决于能够实现其投资目的的空间要素条件。尽管投资主体因性质不同而要求不同的空间要素及其组合,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空

间要素条件(即投资环境)。综观近 20 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形成了以下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

2.1 总体上呈现出东部比重居高不下,中部比重缓慢上升,西部仍处于低水平状态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都集中于东部地区,1981~1985 年期间,东部占 96.8%。从 1986 年以来,开始向全国范围转移,但东部地区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稳定在 85%~90% 之间。中部地区在 1989 年前和西部地区不相上下,均占 5% 左右,从 1990 年开始,中部比重有所上升,达 8%~10% 左右,而西部则处于低谷状态,较前期有所下降,徘徊在 4% 左右(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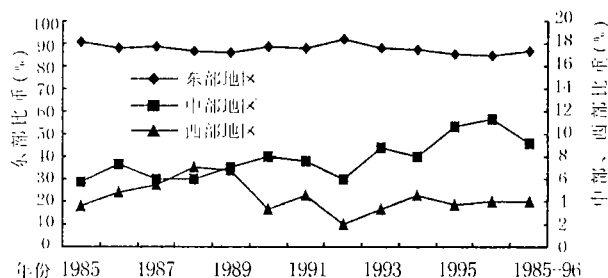


图 1 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推移

Fig. 1 Transference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center and west areas

2.2 地域集中明显,程度渐次减弱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地域上明显地集中于局部地区。1986~1996 年期间累计前 6 位的省市为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占 70.96%。在 1985~1996 年期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等地。但 1985~1991 年期间和 1992~1996 年期间,广东的比重明显下降,江苏、山东、浙江等省有明显增加。1981~1985 年前 6 位的省市广东、福建、上海、天津、海南、辽宁占 94.07%,1986~1991 年期间,前 6 位的省市广东、北京、福建、上海、辽宁、江苏占 76.69%,而 1992~1996 年期间的前 6 位省市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占 71.44%。第 1 位的广东从 75.22% 依次减少到 42.84% 和 28.41%。为反映总体外资投向变化,本文利用外资投向地区地理集中度指数(G)^①来衡量其变化程度。

① 地理集中度指数(G)的计算公式为: $G = 100 \times \sqrt{\sum_{i=1}^n \left(\frac{T_i}{T}\right)^2}$ ($i = 1, 2, 3, \dots, n$)

式中 T_i 为投向第 n 个省(市、区)的直接投资额; T 为直接投资总额; n 为投向省(市、区)的个数,本文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新设立的直辖市重庆市(该市的数据被包含在四川省内),计 30 个省(市、区)。

资金投向越集中, G 值越趋近于 100; 资金投向越分散, G 值越小。1981~1985 年期间的地理集中指数为 76, 1986~1991 年期间为 46, 而 1992~1996 年期间则为 36。1985 年到 1997 年各年度地理集中指数变化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图 2)。1992 年之前有比较大的地理集中指数, 而 1992 年以后则比较小。1992 年以来, 我国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与地区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投放可能的地区。1981~1985 年期间, 占全国比重超过 1% 的省市区仅有天津、辽宁、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等 6 个, 1986~1991 年期间扩展到 16 个, 1992~1996 年期间则扩展到 18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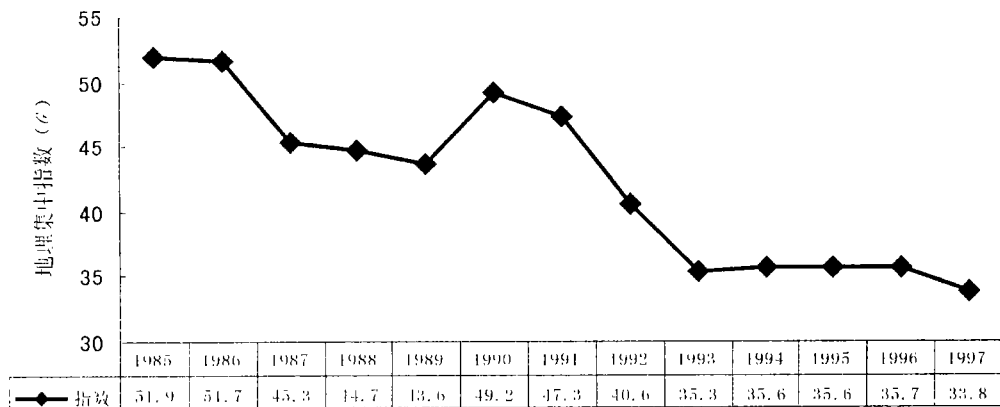


图 2 外资投向地区地理集中指数年度变化

Fig. 2 Yearly index move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域推移的第一步, 即从华南局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推移。1991 年以后,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掀起一个热潮, 1991 年一年中, 中部地区除山西、内蒙古外, 均签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100 项以上, 西部地区的四川在 1991 年率先达到 100 项; 1992 年, 中部地区的山西、内蒙古达到 100 项, 西部的主要省份贵州、云南、陕西、宁夏达到 100 项; 1993 年新疆达到 100 项。到目前为止, 除西藏、甘肃、青海外, 其余省市区均实现了首次年签定协议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100 项。1991~1992 年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热潮, 实现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域推移的第二步, 即从沿海部向内陆部的推移。

2.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从大城市逐渐向周围地区推移

为说明着一点, 利用外资投向地区地理集中指数, 计算得出 1987 年与 1995 年两年间的引进直接投资大省, 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的地理集

2.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从沿海向内陆逐步推移

自 1979 年以来,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件数和金额均逐年增加, 并且逐渐向内陆地域推移。各省市自治区协议利用直接投资项目达到 100 项的年份, 广东在 1980 年, 福建、海南在 1984 年, 广西在 1985 年。即 80 年代前期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先在华南地域开始。其后, 随着对外开放地域从华南扩展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 1988 年东部沿海地区除天津和河北外, 协议利用直接投资项目均达到或超过 100 项, 天津与河北则在 1990 年达到与超过 100 项。到 1990 年为止, 东南沿海地区均达到年签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100 项。完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

中指数, 除江苏外, 其余各省市区地理集中指数均有所减少, 尤其是广东和辽宁减少显著, 说明广东和辽宁省内的外资投向从集中转为相对均衡, 也即为从个别城市向省内其他城市推移(图 3)。1987 年深圳一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占广东省的 48.4%, 1995 年降为 12.9%。1987 年大连一市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占辽宁省的 77.2%, 而 1995 年降为 50.4%。1987 年青岛一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占山东省的 40.7%, 而 1995 年降为 26.9%。江苏省地理集中指数升高的主要理由是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吸引了大量直接投资, 从而使得苏州市 1987 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江苏省的 27.4%, 而 1995 年则增为 49.0%。

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结构的空间转移特征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近 20 年间的观望、摸索与实践中, 应该说对中国不同地域的投资环境已经

有了相当认识,并随着投资目的的变化以及对实现其目的的中国国内各地空间要素及其组合条件认识的深化,以及投资规模与范围扩大,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空间上逐步扩展和转移。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从起步到发展阶段,并伴随着投资市场多元化以及对华直接投资空间结构的演化。对华直接投资在空间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北上、东上趋势,南部、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密集型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内陆化趋势,即向纵深推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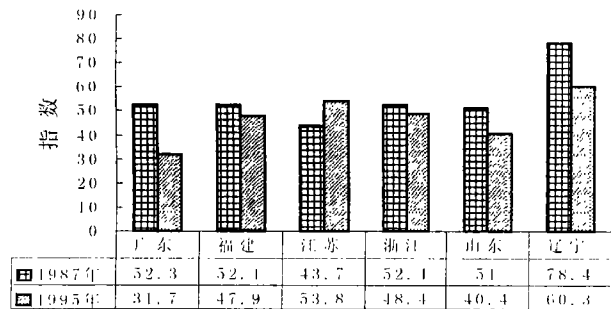


图3 主要省份外资投向城市地理集中指数

Fig. 3 Indexes of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ities of some major provinces

3.1 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逐步上升

将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按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以及技术含量归并为四大类,第一类为L-L型行业(劳动密集-低技术型),包括有食品、纤维、木材、家具、橡胶、皮革、金属制品;第二类为L-H型行业(劳动密集-高技术型),包括出版、印刷、机械、电器、精密机器、运输用机器和其它制造业;第三类为K-L型(资本密集-低技术型),包括纸浆、纸、钢铁业、窑业、土石;第四类为K-H型(资本密集-高技术型),包括非铁金属、化学、石油、煤炭、汽车及配件。按此划分后,1991年以前与1992~1997年期间新增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类型状况如表1所示。

1991年以前在华日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于L-L型行业,占42.8%,其次为L-H型行业,占37.5%,两者(劳动密集型)合计占80.3%,因此可以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上。占第三位的是K-H型,占16.4%,而最少的K-L型仅占3.3%。形成1991年前这种结构可以从以下原因得到解释。第一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追求劳动力

表1 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技术含量及其变化

Table 1 Technical content and its change of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合 计			1991年以前			1992~1997年		
	L-低技术	H-高技术	小计	L-低技术	H-高技术	小计	L-低技术	H-高技术	小计
L-劳动密集型	485	583	1068	115	101	216	370	482	852
构成(%)	32.5	39.0	71.5	42.8	37.5	80.3	30.2	39.3	69.6
K-资本密集型	96	330	426	9	44	53	87	286	373
构成(%)	6.4	22.1	28.5	3.3	16.4	19.7	7.1	23.3	30.4
合 计	581	913	1494	124	145	269	457	768	1225
构成(%)	38.9	61.1	100	46.1	53.9	100.0	37.3	62.7	100.0

资料来源:根据周刊东洋经济,海外进出企业总览(国别篇)1998年版作成。

Sources: East-ocean Economic (weekly),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Import of Overseas enterprises
(Sec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成本低为主导目的,在日本沦为比较劣势而在中国成为比较优势的产业,首推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L-L型),在日本是最早沦为相对劣势产业,而在中国最早成为比较优势行业。第三,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需要有较雄厚的资金实力,该产业所有者多为大型企业集团。由于其本身技术含量高,有一定的所有优势与内部化优势,投资行为接近于欧美式跨国企业型对外直接投资,

因而资本密集且技术含量高的K-H型明显高于资本密集但技术含量低的K-L型行业比重。在此阶段资本密集型行业较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日本较晚沦为比较劣势,而在中国也较晚成为比较优势行业,因此在1991年以前K-L型和K-H型合计低于全体的1/5。

1992~1997年新增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结构发生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为劳动密集型行

业所占比重减少了 10.7 个百分点,也即意味着对华制造业投资的技术含量增加。第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高技术的 L-H 型比重增加,从 37.5% 增加到 39.3%,相反 L-L 型则从 42.8% 减少到 30.2%,L-H 型比重超过 L-L 型 9.1 个百分点。第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 K-L 和 K-H 均有所增加,两者合计占 30.4%,说明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状况有很大改变。第四,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其高技术(L-H 型和 K-H 型)所占比重大幅增加,从 1991 年以前的 53.9% 增加到 62.7%,进一步说明了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的技术含量在增加。1992~1997 年新增对华直接投资技术含量的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解释。第一,日本产业结构高级化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占产业结构中的很少部分,对亚洲直接投资也开始转变以往的结构,而以资本、技术密集为主,自然在对华直接投资上也有所反映。第二,中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尤其是技术水平在近年有很大提高,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中国也开始由潜在比较优势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第三,随着中国人均 GNP 的增加,尤其是在大城市地区工资水平上升,仅仅单靠劳动力成本节约,而不增加项目技术含量则很难在竞争中取胜。第四,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了对不同行业外资投入以及不同技术含量外资的差别优惠政策。国家在政策上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某些地域限制单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外商资本投入。

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逐步上升在地域上体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对华直接投资。像服装、杂货、及其它的来料加工生产,首先投向深圳、广州、珠海、天津、上海等地,进而推展到其外围地区以及福建、广西、山东、辽宁、天津、江苏等地,其后向浙江、四川、湖南等地推进,目前进一步扩展到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吉林、黑龙江、陕西等几乎所有开放地域。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在时间上滞后数年。首先对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伴随着时间推移,扩展到福州、大连、沈阳、长春、南京、重庆、青岛、武汉等大城市地区;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华直接投资首先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开始,进而扩展到天津、广州、深圳、大连、沈阳、长春、南京、福州、重庆等。而管理与知识型产业目前仅投向于北京、上海、广州等

若干个全国经济与信息管理中心城市。

3.2 对华直接投资空间转移呈现出明显高级化与内陆化趋势

综合分析近年来各主要省份与城市引进外资资料与案例,归纳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转移的结构特征如图 4 所示。就一个地区来讲,随时间推移,接纳直接投资产业的技术含量逐步提高,即一个高级化过程;同时随着时间推移,同一类型(技术含量)的产业逐渐由沿海向内陆转移,即一个内陆化过程。前者以日本三菱电机为例,在上海市的第一家企业(1987 年)为电梯、自动扶梯的生产、销售、安装与维修,而 1994 年的第二家在上海的企业则为工业用变频器的生产、销售,以及成套设备控制应用软件的开发,1997 年又在上海设立主要从事半导体的销售、应用技术开发,以及各种技术支持与咨询的起到地域统辖中心机能的企业。后者以日本三洋电机为例,到 1996 年底,三洋电机在华参股与控股法人企业已达 25 家。其中 1983~1987 年期间投资 7 家,1993~1996 年期间投资 18 家。三洋电机 80 年代对华直接投资除 1987 年的北京市东城区外,其余 6 家都集中在广东省,其中深圳 5 家(后从深圳迁至东莞一家),佛山 1 家。90 年代对华直接投资中,投资区位已大大扩展,包括辽宁大连(7 家)、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5 家)、其它地区(合肥、沈阳、苏州(2)、北京、天津)。投资内容也进一步扩张,表现为产品与行业增加,技术含量增加,并在 1995 年和 1996 年分别设立三洋电机(中国)和广东华强三洋集团,从事所属及关联企业的综合管理,起着三洋电机在中国的地域统辖中心的作用。上述这种高级化和内陆化过程是同开放程度从沿海扩展到内陆,经济发展水平在近 20 年间有很大提高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地理惯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二元结构,劳动力的区域间转移受户口制度限制等,使得不同技术含量的对华直接投资产业在特定地域同时存在。

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转移机制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转移,主要是取决于对不同产业而言,在不同的地区所获取要素条件成本的差异,对于以降低劳动成本为中心的港澳资本以及其它亚洲各国或地区资本而言,主要受劳动成本的影响。而资本密集的装置型产业更留意用地取得成本。以降低劳动成本为对华投资驱动的资金,是由于中国国内存在的地域间工资收入差异,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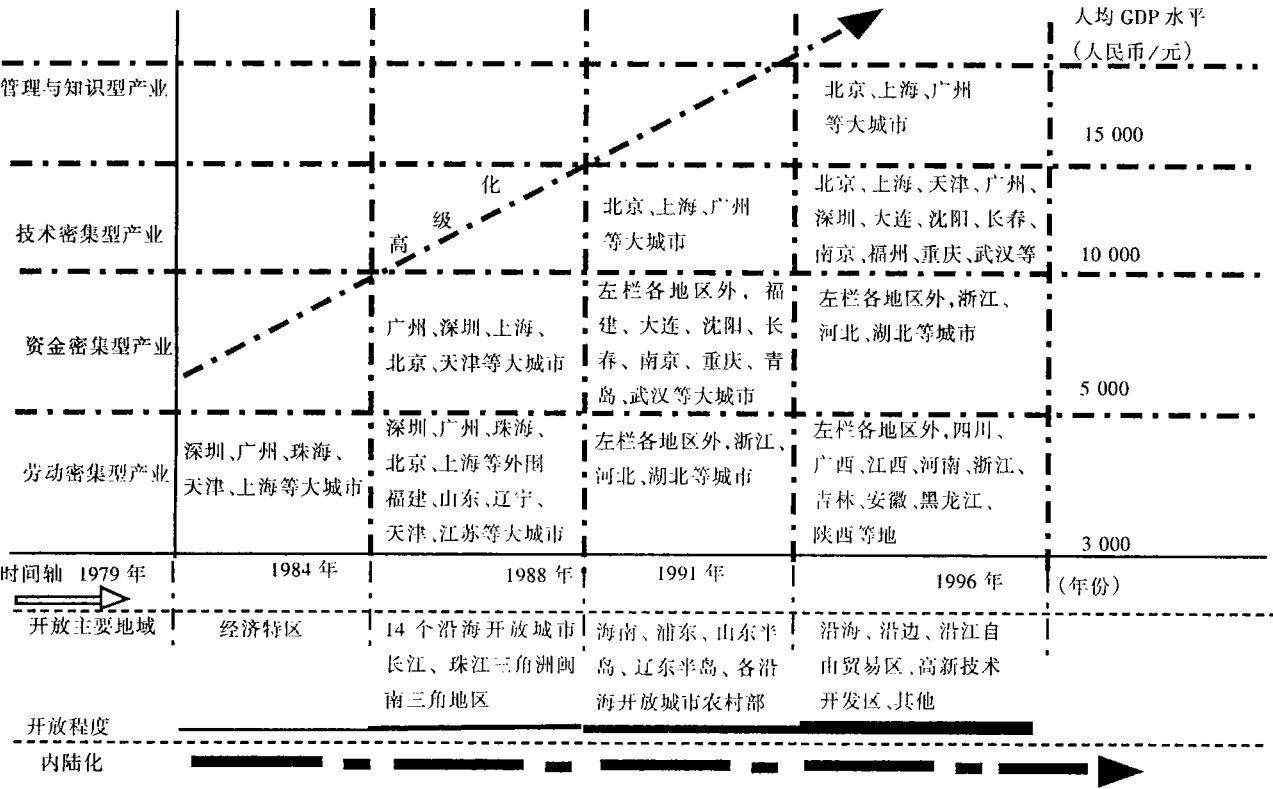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引进外资地域与时间推移示意图

Fig. 4 Sketch map of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import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in different years

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获取难易程度差异,使其发生空间转移。在外资企业集中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尽管存在着大量“下岗”人员,也同样存在廉价劳动力充足供给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因此对于新增劳动密集型投资而言,自 90 年代以来开始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比较普遍。

从集中于少数城市向多数城市,特别是在原有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城市向周围邻近的城市发展。以东莞市东坑镇日本某电子产品(AV 蓄电器)生产厂家为例,选择投资东莞而非深圳的理由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10]。第一是与地方政府(东坑镇)合作,采用委托加工形式,地方政府提供土地、厂房,而该企业提供机械和设备等,避免由于独资而导致的地方性风险;第二是预计东莞也将像深圳一样有发展前景;第三是深圳劳动力不足,且双休两日制在日益普及,因而从成本上不可行,而东莞由于没有进入市界的特殊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入,该厂工人中的 99% 是来自四川、湖南的打工者;第四是东莞的基础设施也在进一步完善,停电次数从以前的周 1~2 次,到两周左右 1 次,供水和通信都不成问题,公路交通改

善,从东坑镇到深圳市中心从以前的开车 3~4 小时,到现在的 2 小时以内。另外,决定在东莞投资还取决于该企业的台湾生产合作伙伴,为企业提供了有关东莞市的企业经营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从总体上说,该企业之所以选择了东莞,首先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保证程度,其次是由于东莞市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企业得到了确切的有关候选地的信息。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信息的公开等,投资中国的企业在向全国各地扩展。

一些不是以降低成本、而是以增加收入为中心的对华投资企业,为了获取市场份额,采取分散配置方式,尽量接近消费者。就中国而言,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内陆居民的购买力在增加,从而使潜在的消费市场开始转化为显在的市场,以扩大销售谋求获得更多收入的对华投资企业也开始了其对中国内陆的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各地区而言,要素条件在逐步变化,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收入水平高,技术力量强,基础设施条件好。因此对于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投资项目也具有很大的拉力,特别是使得从前在华不具

备生产条件的投资也开始成为生产可能的项目。还有中国地域间的政策差异大,对外商而言,土地取得费、税收优惠、工业园区的使用等,都可以起到收入增加的效果。再者对华直接投资空间转移,也是外商所在国或地区在 80 年代以来,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工资水平高涨,生产成本上升,伴随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首先转移到国外或地区。对华投资主体中的港澳、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台湾、新加坡、韩国等,是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开始向国外或地区转移资本,作为其主要接纳国,中国接纳投资的性质也主要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后在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以来,上述国家开始陆续向国外或地区转移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到 90 年代后期则伴随着众多的自国或地区企业特别是同一企业在华多处投资,以管理和控制各所辖企业(工厂)行为及促进其企业活动的投资项目也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立足。对华直接投资主体企业在本国或地区继续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也即企业(产业)开始丧失竞争优势时,就开始了其向国外或地区的资本转移,显示出的作用力属于推力。在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空间转移。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主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各地展开的案例,得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转移特征为:对华直接投资量在空间上相对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所占比重缓慢上升。地域集中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投向地域从沿海向内陆、从大城市向周围地区转移。尤其是投资项目技术含量上升,呈现出在产业层次上的高级化以及空间层次上的内陆化特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比重一直在 85%~90% 之间,中部地区则从 6%~8% 到近年的 10% 左右,西部地区仅占 4% 左右。地理集中指数呈逐年降低趋势,从 1985 年的 51.9 降低到 1997 年的 33.8。除个别省(市、区)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省份的地理集中指数也明显降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逐步上升。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这种空间转移特征形成机制在于,一方面,对华直接投资主体主要是港澳、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企业,其中大部分

又是中小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并没有形成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但由于开发了适用技术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因此,对来自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投资企业而言,追求低成本而实现价格竞争优势构成了这些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决定了其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在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对变化,导致这些以低成本为目的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发生空间转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提高以及技术与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以获取市场份额、增加收入为中心的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日益增加,并随着内陆消费水平提高,出现了从沿海向内陆推移的趋势。同时更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技术以及人力资本梯度差异,因此不同技术含量的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从而导致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差异及其转移。此外,对华直接投资主体国家与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以及中国国内地区间产业与地域政策的变化也加速了这一进程。

参考文献:

- [1] 张岩贵. 境外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及其经济影响[A]. 世界经济年鉴[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46~53.
- [2] Macdougall, G. D. 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J]. Economic Record, 1960, 26: 13~35.
- [3]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66, 192~202.
- [4] S・ハイマー著(宫崎义一编译). 多国籍企业论[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9. 210~211(日文).
- [5] Helleiner G K. 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Less -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ultinational Firms [J].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73, 25~35.
- [6] Dunning J H.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 Defence of The Eclectic Theory[R]. Oxfor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udies, November 1979, 275.
- [7] 中川信义. 国际产业论[M]. 京都: ミネルヴァ书房, 1993. 79~92(日文).
- [8] A・ラグマン(江夏健一等译). 多国籍企业与内部化理论[M]. 京都: ミネルヴァ书房, 1983. 41~43(日文).
- [9] 小島清. 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M]. 京都: 文真堂, 1985. 1~27(日文).
- [10] 藤原弘. 印度、华南(中国)进出企业访问记[J]. JETRO センサー, 1997(3): 29~42(日文).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and Spatial Transference of FDI in China

LI Guo-ping, YANG Kai-zho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871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areas that have the greatest potential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us it has ranked second only to USA in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By the end of 1998, the real value of FDI in China has utilized has added up to \$ 268.1 billion. The big flow of FDI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it has also worsened the existing regional difference by choosing spatial location.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our economy faces new restrictions and opportunities while adjusting its region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i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us how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eek the regularity of FDI in choosing loc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space, to set up relevant strategy to direct FDI at inland regions (areas deficient of capital), and to make appropriate policies, esp. th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policies so as for FDI to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and avoid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a and its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latest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terials and datum of the FDI in China, combin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revealed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FDI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 the main enterprises directly invested by foreign capital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The characters of FDI such as spatial concentration, transference as time goes by, change of the technical content and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ir forming mechanism have been studied. Then the basic conclusions have been made as follows. Firstly, FDI has been highly concentrated in space. But as time goes by, it has been transferring from coastal regions to inland ones, from big cities to their surrounding districts, and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is decreasing. Secondly,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the invested project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up-grad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bvious. Thirdly, the regional choice of the FDI in China is mainly affected by labor and other productive factors. The relative change of the cost of productive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that have caused the spatial transference of the FDI in China. Fourthly, as people's income increas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the technique and labor advances, FDI whose aim is to get more market has increased and tended to transfer from coastal regions to inland ones. Fifth, the change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main areas and countries who have directly invested in China and the changes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es and regional policies in China are also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dustries directly invested by foreign capital and their and their spatial transference.

Key words: FDI in China;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spatial transference; character; mechanism